

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抄藏方志述略

张 毅

提 要：民国时期，方志编纂、收藏、相关理论研究及利用均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方志的搜藏与文献揭示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方志库中，藏有一批特殊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抄藏方志。这批文献近 70 种，抄写时间较为集中，缮写精良，底本多为清志，且不乏现今存世之孤本。抄藏方志中很多为现存稀见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它们反映了当时条件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方志搜求、入藏的努力，对方志文献传播、利用的贡献。

关键词：国立北平图书馆 方志 抄本

民国时期，方志编纂、收藏、相关理论研究及利用均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如方志编纂在体例、门目上的创新，“公私搜藏颇成一时风尚”^① 的方志度藏，方志学的提出与相关研究论著的涌现，方志目录学的实践、方志利用人群的扩大，等等。其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在方志的搜藏与文献揭示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通过政府调拨、接受捐赠、采购、征集等方式积极扩充馆藏，并编纂方志目录，组织纂写方志学著作等。^② 这些在馆务报告、馆史资料中均有记载。

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方志库中，还藏有一批特殊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抄藏方志（以下简称“抄藏方志”）。概因数量不多，所抄底本的版本时代较晚，又与重金购买、名人捐赠等不同，故相关年份之馆刊及先后出版的馆史资料均未见提及。这批文献近 70 种，抄写时间较为集中，缮写精良，虽然底本志书多为清代所修，但其中多有现今存世之孤本，即便抄藏方志本身，也有很多为现存稀见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它们反映了当时条件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方志搜求、入藏的努力，对方志文献传播、利用的贡献。

一 抄藏方志的概况

笔者目前所见抄藏方志凡 66 种（详见简目）。其中除嘉靖《江阴县志》21 卷系明志外，其余均为清代所纂。其中，乾隆时期志书 34 部，占半数之多；康熙时期志书次之，有 23 部；嘉庆时期志书 4 部；雍正时期志书 3 部；道光时期志书 1 部。

从抄藏方志所属的地域看，西南地区最多。其中，四川 27 部，甘肃 7 部，云南 6 部，广西、贵州各 5 部，海南 4 部，湖北、湖南、山西各 2 部，广东、江苏、浙江、宁夏、陕西、安徽各 1 部。

抄藏方志所用纸张有 4 种：一是白纸（见图 1）。二是格纸，四周双边，9 行，白口，单鱼尾（见图 2）。三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专用抄书纸。这种抄书纸又有两种格式：一种为四周单边，

① 《新书介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第 4 号，1932 年。

② 方志目录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续编》《关于西北及研究国内地理方志刊物目录》《民国以来江西所修志书目录》，著作如《方志纂例》（未见刊行）等。

10行,白口,单鱼尾,左下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钞藏”(见图3);另一种为四周单边,11行,黑口,单鱼尾,左下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抄书纸”(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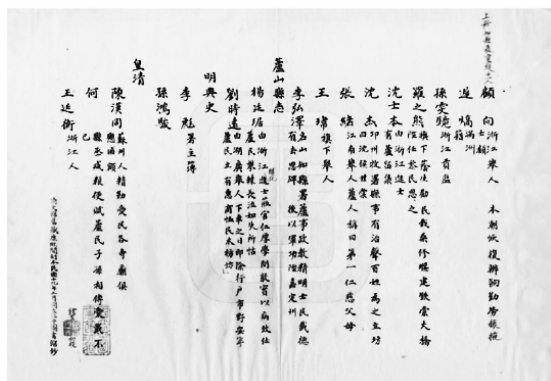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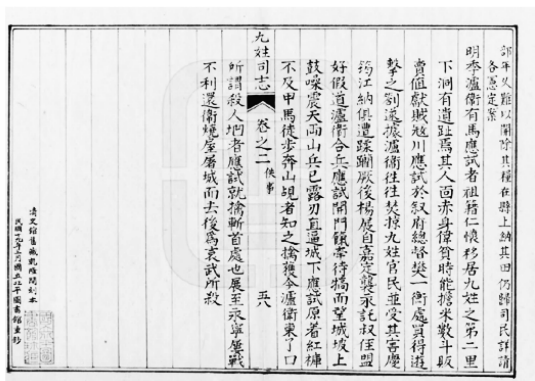


图2



图3



图4

抄藏方志首末均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章。整体缮写清晰、工整,赏心悦目。抄写格式如顶格、分页等皆仿原书,原书中的批注甚至一些错误亦原样抄录,不做改动。如乾隆《玉门县志》“古迹”中有校者眉批写道:“本不必空格,原本因错字空格,钞者依样葫芦。”可推知系抄者照抄实录。我们知道,方志中多有图,如疆域图、县境图、学宫图、八景图等,在抄藏方志中,这些图也被摹绘得很精致。概言之,从抄藏方志可以约略看出原书的风貌。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抄写者对部分底本志书中不易辨识的文字未予抄录,尤其是一些以草书书写的序言,因此造成了文字脱漏现象。如康熙《徐闻县志》阎如珩撰序后有墨笔注:“此书内中缺欠之处均系原书不清。”此外还有个别豕亥鱼鲁,但总体瑕不掩瑜。

抄藏方志的末尾均署有原藏地、版本以及抄书年月,如:“清史馆旧藏传钞乾隆二十六年本 民国十九年二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重钞”^①“故宫图书馆藏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钞藏”^②“故宫图书馆藏 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北平图书馆重钞”^③等字样。部

① 乾隆《江安县志》,民国19年(1930)国立北平图书馆抄本。

② 乾隆《会理州志》,民国2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抄本。

③ 康熙《徐闻县志》,民国2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抄本。

分抄藏方志有朱笔校正,并于书后注有校勘者信息,如“馆员谭新嘉初校”^①,其中“谭新嘉”^②三字为铃印,其余朱笔书写(见图1);偶有加注校勘日期,如乾隆《玉门县志》末注:“十九年一月三十灯下谭新嘉校”。

从抄藏方志末尾所署信息可知,该批志书的抄写时间集中在1930—1933年间,其中1930年22部、1931年1部、1932年13部、1933年30部。所抄志书的底本皆源于清史馆或故宫图书馆藏书。据相关文献记载,1914年,北洋政府在清朝国史馆旧址成立清史馆,库房亦转归其属。1927年《清史稿》成修后,清史馆停办。清史馆大库后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其库内档案、图书分交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图书馆保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抄藏方志均直接抄自故宫博物院。而在1929—1934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或为此批抄藏方志的缘起和实施的重要条件。

在这批文献中,有一些底本为现今存世之孤本,^③如康熙《陵水县志》、康熙《儋州志》、康熙《徐闻县志》、康熙《四川叙州府志·兴文县》^④、康熙《南溪县志》等。2000年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即收录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抄藏方志的底本30余种,如康熙《灌阳县志》、康熙《巫山县志》、康熙《左州志》、康熙《嵩明州志》、乾隆《象州志》、乾隆《白盐井志》、嘉庆《阿迷州志》、嘉庆《建始县志》等。还有更多的抄藏方志本身即为现存稀见方志,^⑤如嘉庆《建始县志》、乾隆《凤凰厅志》、乾隆《忠州志》、乾隆《四川叙州府志·兴文县》^⑥、乾隆《来凤县志》、乾隆《徽县志》等,仅故宫与国家图书馆有藏;^⑦乾隆《太平县志》、乾隆《会理州志》、乾隆《纂辑仁寿全志》、康熙《夹江县志》等,仅国家图书馆与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乾隆《南川县志书》、乾隆《南江县志》等,仅国家图书馆、故宫与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由此可以推断,抄藏志书时经过了一定的遴选,是目标明确的补充馆藏。

二 抄藏方志的价值

首先,抄藏方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补充了馆藏,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同时,抄藏方志有助于珍贵文献的流存,促进这些文献的传播和利用,尤其是对那些稀见方志而言,其价值不言而喻。如抄藏方志中康熙《夹江县志》^⑧，“为夹江首创邑乘”，而且“未刊印，仅有传抄本存下来”；康熙《灌阳县志》^⑨是“现存最早之灌阳县志”。这些珍稀方志多被一些目录解题类著作提及。如乾隆《来凤县志》、雍正《浏阳县志》、乾隆《凤凰厅志》、康熙《左州志》、乾隆《崖州志》、雍正《江油县志》等被收入《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珍本方志解题》^⑩，乾隆《象州志》等被收入陈

① 乾隆《岑溪县志》《凤凰厅志》《开县志》《崖州志》《太平县志》《南笼府志》《芦山县志》等书后均有此语。

② 谭新嘉(1874—1939),字志贤,浙江嘉兴人。1917年被邀入职京师图书馆,负责中文编目工作。笔者所见校者皆为谭新嘉。

③ 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据。

④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康熙《兴文县志》”。

⑤ 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据,本文特指现存藏单位不超过3家者。

⑥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乾隆《兴文县志》”。

⑦ 本文仅指纸本文献,缩微胶卷不计入其中。

⑧ 参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21《四川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75页。

⑨ 参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20《广西壮族自治区》,第39页。

⑩ 参见刁美林、邵岩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珍本方志解题》,故宫出版社,2013年。

光贻的《稀见地方志提要》。

其次,抄藏方志可以校正现存方志目录著录上的缺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于1985年,是研究地方志非常重要的工具书,但因时代与技术条件所限,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少学者已就其存在的错漏进行了诸多订正和补遗。通过抄藏方志,我们可以进一步校正其部分著录不清或错误之处,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在内很多目录著作对于方志抄本著录存在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著录问题的分析,可以有助于对方志版本的认知与考察。例如嘉庆《建始县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清)佚名纂;清嘉庆十七年(1812)修,抄本”;藏地著录为“北京故宫”。而抄藏方志末明确署有“清史馆旧藏写本民国十九年二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钞”。可见国家图书馆和故宫虽均藏有该志的抄本,但却是源与流的关系。又如乾隆《凤凰厅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传抄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藏地著录为“北京故宫、湖南(胶卷)”;抄藏方志末署“清史馆旧藏乾隆间刻本民国十九年二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抄藏”,且经过校勘,此注文当无误,应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出现错误,故宫所藏当为乾隆刻本。除上述两例外,还有如乾隆《来凤县志》、乾隆《江安县志》、乾隆《太平县志》、乾隆《黔西州志》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均存在著录不精确或错误之处。

再次,抄藏方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书的风貌,虽然个别志书的部分文字因原本辨识不清而留白未抄,但在原本不易见到等特殊情况下,抄藏方志仍可作为重要参考。

结 语

抄录是现代技术广泛应用前文献传播的重要手段,方志文献中也时常会见到相关记载。如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弋阳县志》有谭新嘉题识称:“客秋余来襄馆事,获见康熙《弋阳县志》,乃吾家迁禾十世祖左羽公讳瑄宰弋阳时纂修,爱不释手,爰以二十七万钱钞录一部。”^①又如民国《安次县志》卷末马钟琇《跋》中记道:“天启志残本存卷二至卷六,天启甲子刊;康熙志十卷,康熙十六年刊,二书乃借钞于北平图书馆者,旧为清学部图书馆物,即内阁大库移藏本也,虽有漫漶缺卷,而孤本仅存,亦亟需刊播者也。”^②从20世纪30年代迄今不足百年的时间,文献复制、传播的方式由传抄、静电复制、缩微、影印再到数字化,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抄藏这一方式在今天的图书馆入藏渠道中也几近绝迹。彼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顺势而为,一方面努力搜购古旧地志,如天一阁、汲古阁、稽瑞楼等旧藏珍稀秘籍;另一方面大力征集新修志书,据馆史资料记载,1916年与1929年两度呈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征求各省志书;加之抄录补缺,最终使得馆藏方志质量与数量皆获大幅度提升。抄藏方志虽非名家递藏、孤本旧槧,但弥足珍贵,反映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方志搜求、入藏的努力,对方志文献传播、利用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康熙《弋阳县志》,封底,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② 马钟琇:《安次县志》,“跋”,民国25年(1936)增刊本。